

中国文学精神

主编 郭延礼

ZHONGGUOWENXUEJINGSHEN

【汉代卷】

王洲明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山东大学“211工程”重点立项

中国文学精神

ZHONGGUOWENXUEJINGSHEN ZHONGGUOWENXUEJINGSHEN

ZHONGGUOWENXUEJINGSHEN

ZHONGGUOWENXUEJINGSHEN

ZHONGGUOWENXUEJINGSHEN

ZHONGGUOWENXUEJINGSHEN

ZHONGGUOWENXUEJINGSHEN

ZHONGGUOWENXUEJINGSHEN

ZHONGGUOWENXUEJINGSHEN

ZHONGGUOWENXUEJINGSHEN

ZHONGGUOWENXUEJINGSHEN

ZHONGGUOWENXUEJINGSHEN

主编 郭延礼

CHONGGUOWENXUEJINGSHEN

【汉代卷】

王洲明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0.16

中国文学精神

(汉代卷)

郭延礼 主编

王洲明 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0531)2092663 传真：(0531)2092661

网 址：<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规 格：880mm × 1230mm 32 开本

印 张：8.375 印张

插 页：5 插页

字 数：207 千字

书 号：ISBN 7 - 5328 - 4175 - 8

定 价：13.1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精神·汉代卷 / 王洲明著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ISBN 7-5328-4175-8

I. 中... II. 王... III. 文学史—研究—中国—两汉时代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244 号

目 录

概 说	1
第一章 “天地之性人为贵”	
——汉代文学的人文精神	14
第一节 礼乐文化的余韵——汉代乐府诗歌	15
第二节 汉代文人诗的人生思考	32
第三节 汉代抒情赋的人性回归	51
第四节 汉代书信体散文所表现出的士人人格变化	63
第二章 为“大汉”立功立德	
——汉代文学的事功精神	82
第一节 反思历史 应对时事	
——西汉中前期的政论散文	83
第二节 汉代辞赋中的大汉气象	93
第三节 东汉散文的批评精神	107
第四节 汉代文学中的民族精神和英雄崇尚	120
第三章 尊古通变	

——汉代文学的包容与创新精神·····	132
第一节 汉代对文学理论的思考与文学创作上的继承和创新 ·····	133
第二节 史传文学的开创之作——《史记》·····	148
第三节 从《史记》到《汉书》·····	162
第四节 汉人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故事的纂辑·····	181
第四章 汉代文学的浪漫精神与理性精神·····	199
第一节 西汉前期散文和辞赋的浪漫精神·····	200
第二节 汉代的楚辞余绪·····	211
第三节 汉代史传文学中的浪漫精神·····	223
第四节 汉代辞赋的理性精神·····	237
结语：汉代文学精神与汉代文学的风格特征·····	251

概 说

“文学精神”，是以文学作为载体，体现出的思想、观念、行为准则、道德标准、价值取向、人生目标等属于人生理念的一些东西。它是文学自身显示出的精神品格。“人”的追求，“文”的风格，所形成的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总体风貌，就是该时代的“文学精神”。

一个时代文学精神的归纳总结，必须以清理这个时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为前提。所以，文学创作的内容、形式，创作主体的思想变化，哲学思潮、文学思潮、大的政治变故对文学的影响等等，都是我们研究文学精神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汉代，是汉民族融合形成的关键时期。虽然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但它存在的时间很短，汉承秦制，主要指制度方面，至于更深层、更广泛的诸如文化、思想、道德、典章礼仪等范畴，汉代都形成自己的东西，并对以后封建社会的各个时代都起到影响甚至制约的作

用。汉代文学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汉民族形成初期民族精神的显示。

李泽厚在谈到民族心理结构形成问题时说:“秦汉时期不但在物质文明(从生产到科技)以及疆土领域上为中国后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精神文明方面(包括文艺、思想、风俗、习惯等等领域)也如此。正是在汉代,最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个文化——心理结构虽然应溯源于远古,却成熟于汉代。”^①文化——心理结构实际上是要回答汉族人之所以成为汉族人的问题,论述的问题比单纯的文学精神要复杂得多。但李泽厚的这段话给我们以启示,即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思考和总结汉代文学精神。

笔者认为应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表述汉代文学精神:“天地之性人为贵”——汉代文学的人文精神;为“大汉”立功立德——汉代文学的事功精神;尊古通变——汉代文学的包容和创造精神;汉代文学的浪漫精神与理性精神。

一、“天人关系”问题,是我们祖先早就思索和探讨的问题。《尚书》《诗经》都有大量的记载。但探索和思考的不是把“天”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是要沟通“天”与“人”的关系。如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尚书·汤誓》);“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尚书·盘庚》上)。以上是商人的天命观,承认天的存在,天奖善惩恶。周人的天命观有发展变化,从信天发展到怀疑天,但都是把天与人的关系联系在一起。信天,因为天是至高无上的,决定人的生死祸福;怀疑天,是因为天好坏不分,善恶不明。汉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继承了先秦的思想,但又有发展,这就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和“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的宗旨是宣传“天不变道亦不变”,讲天是为行“道”服务的。所以,汉人的

^① 李泽厚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173~17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天人”思考,始终没有脱离人,始终是以人为本位。“天人”关系,可以看作是汉人的宇宙观、世界观,面对纷繁绚丽的外部世界,要解决的主要是现实中的人的问题。汉代的政治、思想、哲学,当然也包括文学,都是这个大前提下的产物。汉代文学高扬人文的旗帜,是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儒家和道家,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很大,对中国人的人格形成影响也很大。儒和道的政治主张、思想信仰不同甚至相反,所探究的范畴和终极目的也大相异趣。但仔细思考,儒家和道家又有相同之处,这就是都思考作为“人”的存在以及以怎样的方式处理“人”与外部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就汉代思想而言,曾经为显学的墨学衰微。法家也因为秦朝严刑峻法短命而亡,不可能引起汉初人的好感。汉初的“黄老”无为,实际上是道家的学说,受道家本身的内容所决定,不可能成为汉朝的统治思想。所以才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思想在汉初特别是文、景之世曾经有很大的影响,但到汉武帝时,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而道家思想只是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而存在。如果从思想文化对汉代作家影响方面来看,毫无异议受儒家影响的文学创作占主流地位。汉代大量的政论散文、历史散文,润色鸿业的汉代大赋,以及反映广阔社会生活的乐府诗歌,都是作为社会的人对社会人生思考的产物。检讨汉代的文学作品,对人、对人生意义思考的深刻,除了儒家思想的积极用世之外,道家思想的深邃也是重要的因素。汉代的说理赋、抒情赋有相当的内容是用道家思想思考人生问题,如贾谊《鹏鸟赋》、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立赋》《归田赋》等。值得注意的是汉代辞赋创作出现了出入儒道两家的倾向,如冯衍《显志赋》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贵玄”,崔骃《达旨》曰:“因天质之自然,诵上哲之高训;咏太平之清风,行天下之至顺”。而《归田赋》在展示汉代文人对儒道思考的文学作品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汉代的诗歌

即使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的乐府诗如《艳歌行》（瑟调曲）、《豫章行》（清调曲）等，也有道家思想影响下人生思考的内容。总之，在儒道思想的作用下，汉代无论散文、诗歌、辞赋，既表现出建功立业的追求，又对人生、爱情、家庭、朋友、生命、死亡等等，都表现出极深邃而又极细致的思索。“文学是人学”，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表述，强调的正是人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以及文学应该以表现社会人生为主要对象。汉代文学高扬“人文精神”，是作为中国文学从洪荒辽远的远古时代，走向定型期之时所显示、所形成的文学基本精神之一。

二、汉代文学的事功精神首先是由汉代士人的地位变化引起的。由春秋时代形成的“士”阶层，到战国时代极其活跃。“士”阶层的兴起和发展，并日益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作用，是战国“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直接原因。需要指出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士”是自由的，严格地讲他们不归属于哪一个政治集团，“朝秦暮楚”“楚材晋用”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法家虽然提出了“士”与封建君主“互市”的主张，但在政治生活中并没有普遍实行。汉王朝建立之后，士人们面临着选择，也就是说在新的统治者面前，如何选对自己的位置，如何适应新条件下的政治来施展才能，一句话，如何做到“适者生存”。应该说，为在位的统治者服务，对士人们来说带有必然性，但也经历了短时期的痛苦的抉择。叔孙通属下博士弟子的议论以至于逃逸，邹阳、枚乘、司马相如先仕诸侯王，后集中到中央王朝，特别是汉代相当一部分书信体的散文所披露的不得意情结，都显示出汉代士人们有一个从“士”到“吏”的发展过程。汉代选官实行察举、试举等不同方式，如察举有举孝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等名目，而试举则由博士弟子经考试而进入仕途，这势必使得年青士人们关心政治，关心经学，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所以，汉朝的文学作家往往兼有或思想家、或经学家、或史学家的身份，尽管中国古代文学作家大都有这个特点，但在汉代又表现得特别突出。士人心目中的“立德”“立功”的

想法比以文扬名的想法不知要强烈多少倍。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汉代的文人对政治表现出空前的热衷。从贾山、贾谊、晁错的西汉鸿文,到盐铁会议、白虎观会议;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到王符《潜夫论》、仲长统《昌言》,都表现出对政治的热情。汉代的议论散文,西汉论政以建言为主而同时有批判的内容,东汉论政以批评为主而同时有建言的内容。论政中的建言也好,批评也好,都表明汉代文人把自己的命运前途和国家政治连在一起,通过对政治的关心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念,表现出强烈的建功立业的精神。汉代辞赋是汉代文学创作的主流,因为它代表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所以往往以汉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尽管长期以来人们对汉赋的评价不同,但谁都相信,如果没有了汉赋特别是汉大赋,我们对汉代、对汉代文学的了解,将会欠缺到什么样的地步。汉大赋是一份极其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内容不外乎京苑羽猎,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辽阔无际的猎场,奔驰风发的车骑,孔武有力的武士,强悍无比的角逐;也不仅是“金城万雉”,“周池成渊”,离宫别馆,宫殿云屯;我们还看到沃野千里,五谷丰登,天下祥和,“四夷贡珍”,以及都市房舍的鳞次栉比,铺面林立,五行八作,士男士女,浩歌遏行云,妙舞起婆娑,依依细柳,皑皑白雪……它们都显示出无限的生气,是汉朝上升阶段真实生活的写照。汉朝人的大度,汉朝人的雅量,汉朝上层统治者生活的优雅阔绰,汉朝人的宽衣博带、雍容华贵,包括汉朝人眼中的神奇鬼怪、天地神灵,都是那样耀眼醒目。它们从一个重要方面展示了汉代恢弘的气度,张扬了汉代奋发有为的精神。至于所谓汉大赋的“劝百讽一”“曲终奏雅”,与其所表现出的汉帝国的恢弘气度、奋发有为的精神相比,实在是显得微乎其微。

汉代四百年,是士人人格裂变时期,也是逐渐完备的时期。虽然

有以追求道家自然作为补充,但立功立德的人格追求,始终占主导地位。汉人立德立功的追求中,有强烈的英雄崇尚。我们读《史记》《汉书》中的传记文学,为失败的英雄如李广、李陵、司马迁等人不公正的遭遇而掬一把热泪;为成功的英雄如终军、傅介子、卫青、霍去病、苏武等人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和浩然正气而感到昂扬奋发。这些英雄人物身上代表着民族的精神,代表着民族的正气。汉民族顶天立地的形象首先是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

三、汉民族是一个富有包容和创造精神的民族。在民族形成和确立的汉代,这一特点就已经非常明显。尊重传统,是汉民族认知上的特点,也是精神上的特点,但同时,汉民族又在继承中有着创造和开拓的精神。

汉代人显示出非常宽阔的胸襟。汉承秦制,汉代扬弃了秦的严刑峻法,但保留了合理的政治体制制度。周代近千年的优秀文化思想,汉继承和发展了。以“仁”为核心的礼乐教化,在汉代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正是在汉代,实现了民族的融合,建立起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汉帝国。重视历史文化的传统在汉代发展到了极至。汉人的读经遭到近代的非议,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经学一旦把经义当作一切行为的准则时,人的主动精神便被抹杀了。但又要看到,在经学的形成期、发展期,汉人勇于继承先人的思想主张,不能不说也是宽容心胸的一种表现。至于对历史的总结,《史记》《汉书》是中国史学的两大高峰。《史记》是司马迁在寻民族的根;《汉书》是班固在记汉代的魂。它们的写作都有自己的原因,但谁都不能否定,是时代的气息、精神造就的结果。对学术的总结,是汉人胸襟阔大和富有包容精神的又一表现。《汉书·艺文志》对西汉以前包括西汉的学术作了全面细致的总结和整理。这一工作,刘向、刘歆父子功绩卓著,当然也有班固的努力。

汉代在对文学理论性的思考上和文学创作实践上,同样体现出

包容和创造精神。先秦对文学已经有理论上的认识和总结,如对《诗》的兴、观、群、怨的文学功用性的认识,对蕴含其中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第三)的中和美的认识,对“尽善尽美”(《八佾》第三)文学内容和形式关系的认识等。汉人继承并大大发展了这些理论。《诗大序》的情、志统一说,注意到了《诗》言志和言情的双重功能。郑玄《诗谱》从《诗》产生的时代、地理、历史沿革中,对《诗》作全面评论,以及他笺《诗》实践从体味形象入手,注意到《诗》的形象特点,尽管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但触及到了作为文学性很强的《诗》的某些本质性特征。在创作方面,汉代乐府民歌与《诗经》的“国风”在精神上一脉相承,并且更加突现了诗歌写实性的特点。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对汉代文学的影响,大大超过了文学史上任何一种文体对后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换言之,汉人无论在精神上和文学形式上,都继承和发展了楚辞文体,从骚体赋到汉大赋,从骚体诗到五言诗,都能看出汉人在继承和创新方面所作的努力。

《史记》是纪传体文学开创之作。《史记》之前的历史典籍,诸如《尚书》《国语》《世本》《左传》《战国策》以及诸子百家等,无疑给司马迁提供了写作的素材。《史记》的继承性,固然在于承袭历史素材,同时也承袭了重视历史的精神和忠于史实的良史传统。在构思和完成《史记》宏篇巨制的制作时,又体现出作者自己的思考和认识,从而熔铸成新的精神,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首先,《史记》在史书写作体例上有创造性,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分类记述历史;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体例的写作体现出作者的精神追求。司马迁的精神追求包括:强烈的民族意识、强烈的士人意识、强烈的批判精神、强烈的英雄崇拜和强烈的探索精神。司马迁把这种追求归结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历史的事实是不能更改的,但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却可以渗入叙述者的感情,特别当这种感情渗入与文学表现的某

些因素相结合的时候,历史就不仅只是个别历史事件的联系,而是立体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甚至可以说是体现精神的载体。中国历史本来就有以史为鉴的传统,《左传》中的“君子曰”就是在评价历史。《战国策》虽然没有对历史的直接评判,但并不是说没有一点倾向性。而司马迁的《史记》则在继承上述传统的基础上,将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体现精神,是《史记》的灵魂所在,也是《史记》的魅力所在。至于《史记》在人物传记写作中所涉及到的组织材料、叙述故事、塑造人物等方面的成就,就更是司马迁创造性劳动的结果。

四、汉代文学就总体而言,缺乏灵动飞扬的气氛,厚重有余而灵气不足。事物又总是复杂的多面体,有主导的方面,也必然有次要的方面。汉初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战国时代流行于燕、齐的仙道思想的影响,儒和道的互补,特别是楚辞的影响,又使汉代文学有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一面。汉代文学同样表现出浪漫精神和理性精神。

楚辞对汉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这首先表现在汉代文人的人格形成上,他们自觉不自觉地 from 楚辞和屈原身上寻找依据。对屈原的歌颂也好,从楚辞寻找寄托也好,甚至是对屈原的批评也好,都是这种努力的表现。如贾谊、司马迁、淮南小山、扬雄、王褒、刘向、王逸等,都从自己不同的境遇出发接受楚辞。这是楚辞对后代作家影响的第一次浪潮,其浓重的抒情意味,升天入地非现实的描写,以及大量的“引类譬喻”比兴象征的表现手法,以其别异的风格特点,点缀着汉代的文坛。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专列《汉宫之楚声》一章。从刘邦的《大风歌》、项羽的《力拔山兮歌》,到汉武帝的《秋风辞》;从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的《悲歌》,再到出塞公主刘细君的歌唱,汉宫之楚声不绝于耳。至于《郊祀歌十九章》、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也都是楚辞体的诗歌。这些歌唱,因袭的主要是楚辞哀怨抒情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属于伤感文学,但那气韵,那情调,给以质实为主的汉代文学

带来一种异样的气息。

汉赋受楚辞的影响是明显的。“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文心雕龙·诠赋》第八），就是讲汉赋与《诗经》、楚辞的关系。作为浪漫作品的楚辞，影响及汉代辞赋的浪漫精神和浪漫的艺术表现。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所列十大辞赋家属于汉代的就有八家，并说：“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鹏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贍；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称他们为“辞赋之英杰也”。所列八家赋作，有的强调内容，有的强调写法。其对两汉特别是西汉社会的发展作夸大的描写，字里行间展示、烘托时代向上的精神，对人生祸福、生死所作的深刻思考，以及艺术表现上结构的宏大，构思的奇巧，语言的靡丽，都表现出浪漫的精神风貌。应该说，以上总结的精神和表现上的特点，并不限于上述八家赋作。以前研究汉赋，过分强调汉赋的写实性，过分强调其歌功颂德的写作目的和社会功用，而忽略了作为文本上的浪漫特点，这是值得注意的。

汉代散文的浪漫精神，在西汉前期，既受到战国纵横家的影响，又受到楚辞的影响。如贾山、贾谊、晁错等笔下的政论散文，风格尽管不完全一致，但都纵横捭阖，铺张扬厉，行文中有一股张力和底气。像枚乘、邹阳、东方朔等人的散文，又充满机智和富有韵味。它们都有神有气，做到了神与气的统一。与汉中叶以后散文平实规整的总体风格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司马迁的《史记》有奇气，与受战国纵横文风的影响有关，也与司马迁对道家自然观的追求有关。《史记》的奇，当然首先指精神上的与众不同。“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写作指导思想，对游侠、对失败英雄的偏爱，蕴含在整部作品中的不平之气，当然是浪漫精神的重要方面。《史记》的“奇”还在文气方面，苏辙评论司马迁的文章“疏荡颇有

奇气”，并说“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栎城集》卷二二）。它不像《汉书》那样地比较守规矩，文章的详略长短，轻重缓急，随着感情任意挥洒，在好的传记文中几乎看不到人为的痕迹。东汉史传文学《吴越春秋》，内容为详细记载先秦时吴、越两国的历史。但与一般史书又不同，不时穿插神奇故事，并多处作夸张地描写，同样具有一股浪漫的气息。

诚然，与魏晋六朝文学相比，与隋唐文学相比，同样是浪漫特征，汉代文学的浪漫似乎缺少点什么。东、西汉相比，西汉特别是前期，浪漫的东西更多一些；诗歌、辞赋与散文相比，诗歌、辞赋浪漫的东西更多一些；而总体看，汉代文学中的浪漫个性少一些，而属于共性的东西多一些。换言之，汉代还没有哪一个作家或作品以浪漫作为创作的主导特征并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汉代文学又的确有属于浪漫特征的因素，《文心雕龙》说“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文心雕龙·通变》第二十九）。这里讲的是各个朝代文学总体上的风格特点。楚汉的“侈”和“艳”，包括属于浪漫特色的内容。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①汉代的文学特点，包括汉代文学的浪漫因素，都与这个大的经学氛围有关。也正因为此，汉代文学中的浪漫特征，表现出更多的共性特点。

汉代文学理性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汉代的文学作品表现出较多、较明显的理性思考。也即是说，许多属于纯文学的作品中蕴涵深刻的理性思考。其二，汉代思想家较多用文学的方式来论述阐释理性的问题。也即是说，汉代大量的政论散文、哲理散文，它们本身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用泛文学的观念研究汉代文学，它们又具有较明显的文学特征。关于第一点，以汉代辞赋创作为例，骚体抒

^① 刘师培著：《刘师培学术论集》，第23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情赋为楚辞嫡传,但又有许多异变,牢骚不平之中有了明显的以道家作为调节的内容;说理赋或崇尚道家的自由,或出入儒道两家;汉大赋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直接影响的产物,儒家思想中联系实际、喜好文饰、以及规谏劝勉等特点,在大赋中都有表现,所以有“古诗之流”的评判;至于咏物赋,内容是对周围事物的观察和体验,写出生活的情趣,是经过儒道思考之后,在世俗生活中找到放松精神的另一片天地。关于第二点,用文学的方式来论述阐释理性问题,这是先秦文学(特别是散文)早已形成的传统。汉人继承这一传统,所探讨的理性问题虽不如先秦人广泛,却更拉近天道自然与社会人事的关系,比如,西汉的《淮南子》,东汉的《论衡》。《淮南子》产生于西汉前期,以道家思想为主。作者在谈到著书的宗旨时说:“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惧为人之昏昏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淮南子·要略》)。东汉高诱注《淮南子》在《叙》中说:“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煮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淮南子·叙》)从书的篇目,如《原道训》《俶真训》《天文训》《坠形训》《时则训》《览冥训》《精神训》《本经训》《主术训》《泛论训》《说山训》《说林训》《修务训》……涉及到天文、地理、宇宙、人事,其内容之广,理论之深,体例之大,文辞之富,都是罕见的。《论衡》是一部理论著作,并同时具有文学性。它产生于东汉前期,经学已经神学迷信化,王充从事实出发,祭起“疾虚妄”的旗帜,多用形象的方式对神学迷信进行无情地批判。

五、汉代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思维模式。汉代的思维模式,是在汉代大的理论环境中产生的。先秦具有多元的思维模式。儒家